

“希腊的教育者”

——荷马的政治理论

任军锋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摘要: 在西方精神传统中,从文学形式到思想格局,荷马将人类的精神创制提升至登峰造极的高度。《荷马史诗》是西方思想的天然母体和丰沛源泉,成为悲剧家和史学家的基本素材和灵感来源。本文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各自的思想理路以及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入手,揭示两部史诗的创作意图及其政治教诲,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柏拉图与荷马、哲学与诗歌之争的核心要义,以及这一争执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关键意义。

关键词: 荷马史诗; 柏拉图; 阿喀琉斯; 奥德修斯

中图分类号: B50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2025)03-0092-11

DOI:10.19833/j.cnki.jyu.20250606.006

在西方精神传统中,荷马俨然史诗的化身。《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前后相续,彼此烘托,浑然天成,共同架构起《荷马史诗》这部巨幅文化长卷。

无论是文学形式还是思想格局,荷马都将人类的精神创制提升至登峰造极的高度。《荷马史诗》成为西方思想的天然母体和丰沛源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化用荷马的笔法,将著述对象从诗人笔下的可能之事转向已然之事,透过特殊之事洞见一般之事。如果说《荷马史诗》是首先针对有教养的贵族的说唱艺术,那么悲剧则是面向普罗大众的舞台艺术,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为代表的悲剧诗人往往直接从史诗中截取素材,发挥演绎乃至翻转其中荷马式的精神教诲,同时与时代议题有效衔接,彼此呼应,借古喻今。正是透过悲剧家们对《荷马史诗》中吉光片羽的创造性转化,荷马得以进入公元前5世纪希腊普罗大众

的视野,荷马的教诲开始渗透于希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此,柏拉图评论指出,作为最富诗意的诗人,荷马是悲剧诗人的先驱,是“希腊的教育者”(τὴν Ἑλλάδα πεπαίδευκεν)^①。

《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彼此烘托,荷马将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两位英雄截然相反的身后情景彼此对观。以阿喀琉斯为代表的荣誉观与奥德修斯所代表的城邦荣誉观互为借镜,彼此对观,诗人的教谕指向呼之欲出。贯穿《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复仇主题,均以神意促成下的和解收尾。在宙斯的敦促和安排下,阿喀琉斯与普里阿摩司和解,奥德修斯与伊塔卡权贵家族和解。透过两场在情节上略显突兀的和解,诗人深沉的悲悯和淑世情怀跃然纸上。诗人在透过“现实主义”的笔法勾勒人性的同时,也试图通过“理想主义”的文学创制重塑人性,涵育人心,在被极端恶充塞的现

收稿日期: 2024-11-07

作者简介: 任军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① 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年,606e。

实世界寻找树立美善的可能。^①

在西方精神史上，诗与哲学之间的“古老纷争”至柏拉图可谓别开生面。柏拉图式的哲学技艺与荷马式的诗歌技艺，科学式的抽象思维与神话式的具象思维，共同支撑起西方精神世界的基本框架。柏拉图式的哲学教育传统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价值革命。正是透过柏拉图的这一新的文化创制，西方文明精神别开新局，获得了更为坚实的精神根基。

一、两种荣誉之争：从个人到城邦

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被视为整个希腊世界共同行动的起点，史诗本身也成为希腊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端。^②《伊利亚特》《奥德赛》两部史诗均以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初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伊利亚特》的历史视野涵盖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十年，《奥德赛》的历史视野涵盖的则是战后奥德修斯归返途中十年的种种遭际。

僭主庇西特拉图统治时代（前560—前527），雅典国势蒸蒸日上，雅典人开始以希腊人的共同事业为己任。为了提升并强化雅典人的文化自信、增强整个希腊民族的凝聚力，在僭主本人的亲自督导下，《荷马史诗》的校订成为这一时期新帝国标志性的文化工程。二代僭主希庇亚斯统治时期（前527—前510），雅典一如既往地坚持贯彻庇西特拉图的文化政策，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在希庇亚斯本人的戮力推动下，公元前520年，《荷马史诗》正式成为泛雅典娜节期间的规定赛事。^③赛事上歌人接龙轮番吟诵。此后该项赛事长期相延不辍。^④

《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在母亲和宙斯的帮助下成就了个人荣誉的传奇。阿喀琉斯与

阿伽门农围绕荣誉的象征——战利品的分配发生争执，因丧失自己应得的部分而怒不可遏。阿喀琉斯求助于母亲女神忒提斯，后者转而祈求宙斯“暂且给特洛伊人以力量，使阿开奥斯人尊重我的儿子，给予他应得的赔偿”，以此报复阿伽门农。^⑤当战争的天平转向特洛伊人一方，阿喀琉斯依然拒绝出战，借以迫使阿开奥斯人“来到我膝前，向我求情”。^⑥面对好友帕特罗克洛斯的主动请缨，阿喀琉斯表示同意，并将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使你在全体达那奥斯人中为我树立巨大的尊严和荣誉，让他们主动把那个美丽的女子还给我，连同丰富的赔礼。”^⑦与此同时，阿喀琉斯还不忘祈祷神明：“但愿所有的特洛伊人能统统被杀光，阿尔戈斯人也一个不剩，只留下我们，让我们独自去取下特洛伊的神圣花冠。”^⑧

阿喀琉斯无国无家，无牵无挂，孑然一身，我行我素，他的心目中只有个人以及个人荣誉。他以自我为中心，对于周遭世界异常敏感，只要发现任何可能损及自身荣誉的苗头，都会不遗余力地将其扼杀于萌芽。即便是对贵为盟军统帅的阿伽门农，他也没有任何容忍退让的余地，甚至拔刀相向也在所不顾。即便是长期亲密无间的同伴帕特罗克洛斯，也不过是阿喀琉斯借以成就自身荣誉的工具。在阿喀琉斯的心目中，个人荣誉高于生命本身，无论是自己还是他者的生命，均不得不服服务于这一最高目的。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赫克托尔在阿波罗的支援下将帕特罗克洛斯杀死。阿喀琉斯悲痛欲绝，当初出于个人荣誉受损的愤怒迅速升级，他的报复对象也从阿伽门农身上迅速转移至敌方赫克托尔身上。于是阿喀琉斯主动要求与阿伽门农和解，意欲共同对抗赫克托尔。但对阿喀琉斯来说，和解本身绝非出于他对阿开奥斯人共同事业的责任心，而只不过是借以讨伐

① Samuel Eliot Bassett, *The Poetry of Homer*,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3, p. 244.

② [古希腊]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I，3.1-3.4.

③ Cedric H. Whitman,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New York: The Norton Library, 1958, p. 76.

④ 柏拉图《希帕库斯》，胡稼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年，228b.

⑤ 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509-510.

⑥ 荷马《伊利亚特》，11.609-610.

⑦ 荷马《伊利亚特》，16.84-86.

⑧ 荷马《伊利亚特》，16.98-100.

更大的私敌所赖以凭借的手段罢了。就这样,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谋式和解,也在客观上促使希腊联军距离攻陷特洛伊城池这一最终目标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对阿喀琉斯来说,个人的荣誉需要周遭世界的撑持,然而追求个人荣誉的征程却不得不以周遭世界的毁灭为代价。手段与目的在阿喀琉斯身上出现了某种吊诡式的悖论,这种悖反甚至连英雄自己生前也未能自觉意识到。阿喀琉斯退出战斗并非真的退出,而是报复政治对手阿伽门农的手段。阿喀琉斯暂时退出,希腊人遭遇惨败,为此,阿伽门农不得已主动向阿喀琉斯认错,同时被迫补偿其当初给阿喀琉斯造成的荣誉损失。在阿喀琉斯的世界里,自我从来就是他一切行为抉择的核心,周遭只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成全自我,即使以牺牲无数战士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在这里,阿喀琉斯期待的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战争双方同归于尽,自己独享胜利花冠。

阿喀琉斯无家无国,了无牵挂,这导致他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甚至任性狂暴,作为弥尔米冬人的首领,我们看不到阿喀琉斯对其子民的一丝挂念,对自己旗下战士安危的任何关切。杀死赫克托尔之后,阿喀琉斯依然余恨难消,并想方设法凌辱赫克托尔遗体。眼见阿喀琉斯漫无节制的残暴之举,神明被迫介入,阻挠阿喀琉斯的野蛮行径。阿喀琉斯本想进一步攻陷特洛伊城池的企图最终在神的阻挠下并未兑现,神在这里仅仅成全了他报复私敌赫克托尔的欲念。

在《奥德赛》中,进入冥府探问自我命运的奥德修斯与阿喀琉斯魂灵之间那则耐人寻味的对话,恰恰可以作为阿喀琉斯对自己曾经机关算尽捍卫个人荣誉的注脚。奥德修斯首先对阿喀琉斯称赞道“阿喀琉斯,过去未来无人比你更幸运,你生时我们阿尔戈斯人敬你如神明,现在你在这里又威武地统治着众亡灵,阿喀琉斯啊,你纵然辞世也不应该伤心。”对于奥德修斯由衷的赞誉,阿喀琉斯的魂灵却颇为无奈地

回应道“光辉的奥德修斯,请不要安慰我亡故。我宁愿为他人耕种田地,被雇受役使,纵然他无祖传地产,家财微薄度日难,也不想统治即使所有故去者的亡灵。”^①阿喀琉斯接着迫不及待地向奥德修斯打听身后爱子的情形。听到奥德修斯说爱子作战勇敢且安然无恙,阿喀琉斯的魂灵随即“迈开大步,沿长青的草地离去,听说儿子很出众,心中充满喜悦”。^②《奥德赛》中作为普通父亲的阿喀琉斯与《伊利亚特》中超凡脱俗的英雄阿喀琉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③可以说,冥府中的阿喀琉斯对战场上的阿喀琉斯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反讽式解构。只有在阴冷潮湿的冥府中,阿喀琉斯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普通父亲本身的价值,他第一次走出了“自我”,尽管这一步尚未越出血亲伦理的范畴,更未触及个人在树立城邦秩序过程中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如果说《伊利亚特》是一部阿喀琉斯捍卫个人荣誉的战争史诗,那么《奥德赛》则是一部奥德修斯历经长途跋涉最终返回家园的苦难史诗。战争与苦难,相伴而生,无论是对战败者还是凯旋者,都必须同样面对。当战争的幸存者纷纷返抵家乡的时候,奥德修斯却在海上四处漂泊,历尽磨难,最终滞留在奥古吉埃岛神女卡吕普索的洞穴。本来,神女对奥德修斯一往情深,每日锦衣玉食,关怀备至,并且许以长生不死、不老容颜,欲与奥德修斯一道岁月静好。然而奥德修斯自始至终初心不改,即便前路险象环生困难重重,依然渴望尽早返回家园。在费埃克斯,公主瑙西卡亚对奥德修斯一见倾心,国王阿尔基诺奥斯也有意挽留奥德修斯做自己的乘龙快婿,奥德修斯却婉拒了国王和公主的美意,最终在费埃克斯人船只的护送下如愿回到伊塔卡。回到伊塔卡的奥德修斯在儿子特勒马科斯和两名奴隶的配合下,经过周密部署,诛戮一众求婚者。奥德修斯一家终得团圆,城邦秩序与王权也得以恢复。可以说,奥德修斯的归程俨然“政治人”的回归。他需

① 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1.488-491.

② 荷马《伊利亚特》,11.467-540.

③ Jasper Griffin, *Homer the Odysse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92.

要不断超越自我的坚定信念，抵抗种种诱惑的过人毅力，能够在采取必要的强力之后做到适可而止。奥德修斯的归返艰难且漫长，他需要战胜死亡、展示生命的过人勇气，“他对伊塔卡的人际关系执着依恋、他的和解精神以及他的适应性，把他同《伊利亚特》中的那些注定失败的英雄们的更苦涩的理想区别开来，并形成了另一种英雄主义”。^①

如果说奥德修斯针对求婚者的复仇与阿喀琉斯的复仇都是出于荣誉，那么两人的荣誉观可谓大异其趣。对阿喀琉斯来说，荣誉是纯属个人的，而对奥德修斯来说，荣誉始终与家庭和城邦融为一体。当初在冥府之中，先知忒瑞西阿斯曾就奥德修斯的命运作出过预言，据奥德修斯自己回忆，他将再次游历无数的人间城市，“死亡将会从海上平静地降临于我，让我在安宁之中享受高龄，了却残年，我的人民也会享福祉，他说这一切定会实现”。^② 荷马将阿喀琉斯与奥德修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后情景并置，在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分别代表的两种荣誉观之间的厚薄褒贬，细心的读者从中不难窥其一斑。而赫克托尔和奥德修斯一系的英雄类型及其承载的价值观，正是罗马大诗人维吉尔标举的罗马式英雄埃涅阿斯的希腊原型。赫克托尔、奥德修斯正是诗人推崇的“政治人”的至高典范，他们顾全大局，中正节制，将个人荣誉的追求转化为公共责任的重负。

二、悲悯的道德和政治理想

《伊利亚特》开篇序诗这样写道 “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愤怒，那一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把战士的许多健壮英魂送往冥府，使他们的尸体成为野狗和各种飞禽的肉食，从阿特柔斯之子、人民的国王同神样的阿基琉斯最初的争吵中分离

时开始吧，就这样实现了宙斯的意愿。”^③

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最初的争吵毋宁是之后一系列连锁反应的起点，如果说最初的争吵依然在当事者的可控范围，而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战争本身获得了自我运转的强大动力，战事参与各方相继沦为不断加码的复仇链环中的牺牲品。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如此，希罗多德笔下的波斯战争和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样如此。

在与阿喀琉斯决斗之前，赫克托尔提议双方以杀死对方并剥夺铠甲为限，遗体须交还对方阵营，然而这一要求却遭到复仇心切的阿喀琉斯的断然拒绝。杀死赫克托尔之后，阿喀琉斯想尽各种办法恣意凌虐赫克托尔遗体，并故意让其父母和妻子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使他们痛不欲生。目睹阿喀琉斯如此“恶毒成性”“狂暴如狮”“丧失了怜悯心”且“不顾羞耻”，宙斯最终通过忒提斯要求阿喀琉斯接受赫克托尔的父亲普里阿摩斯的礼物，并归还遗体。在赫耳墨斯的引领下，普里阿摩斯亲自登门向阿喀琉斯祈求归还爱子遗体。老人将心比心，以父亲的身份诉说了自己的孤苦无依与丧子之痛：“阿喀琉斯，你要敬畏神明，怜悯我，想想你的父亲，我比他更可怜，忍受了世上的凡人没有忍受的痛苦，把杀死我的儿子们的人的手举向唇边。”^④ 老人这一席话勾起了阿喀琉斯对自己业已过世的父亲的眷念，想到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顿时悲从中来。就这样，两位先前的死敌抱头痛哭：这厢儿子在哭悼已故的父亲，那厢父亲哭悼新丧的儿子。至此，阿喀琉斯先前心中郁积的怨恨开始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的在世生存的深切悲悯。此时此刻，阿喀琉斯心中涌起的不是胜利者的快感，而是强烈的幻灭感，“自己与被自己杀死的人，本质同类”。^⑤ 阿喀琉斯主动上前对普里阿摩斯这样安

① [美] 查尔斯·西格尔 《〈奥德赛〉中的歌手、英雄与诸神》，杜佳，程志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72页。

② 荷马 《奥德赛》，11. 134-137；23. 281-284。

③ 荷马 《伊利亚特》，1. 1-7。

④ 荷马 《伊利亚特》，24. 503-506。

⑤ [英] 加斯帕·格里芬 《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张巍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Mark Edwards, *Homer: Poet of the Ilia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13.

慰道“让我们把忧愁储藏在心里,尽管很悲伤,因为冰冷的哭泣没有什么好处。神们是这样给可怜的人分配命运,使他们一生悲伤,自己却无忧无虑。宙斯的地板上放着两只土瓶,瓶里是他赠送的礼物,一只装祸,一只装福,若是那掷雷的宙斯给人混合的命运,那人的运气就有时候好,有时候坏。”^①

至此,阿喀琉斯从一位充满嗜血欲的复仇者转变为充满深切怜悯心的共情者。这种共情绝非强者对于弱者居高临下式的同情,更不是战胜者对战败者一时兴起式的怜悯,它毋宁是对人类苦难的共在性和厄运的普遍性的强烈意识和高度自觉。^②可以想见,这样的象征性场景,自然出自诗人的刻意安排。^③也只有诉诸大神宙斯,如此匪夷所思的剧情反转才显得可信且合乎常理,且更加符合常人的心理预期。而这里的宙斯毋宁是诗人荷马的人格化身,其中显然寄托着诗人心中的愿景。这种愿景在现实世界尽管匪夷所思,但却并非毫无根据的文学想象,而是基于阿喀琉斯与普里阿摩斯所共有的普遍人性。诗人诉诸人性深处依稀可见的人性微光,不遗余力地寻找克服或者规避极端恶的一切可能条件。这一突转式的情节毋宁是诗人出于不忍之心而作出的文化想象和秩序创制。不难想见,现实中赫克托尔的下场必然如阿喀琉斯早已宣誓的那样被碎尸万段,成为野狗的美餐。

在《伊利亚特》中,对于战争两造,诗人都给予了同样深切的情感关注,理智上真诚中正。这里的“中正”绝非事不关己置身事外的所谓“价值中立”,亦非现代布尔乔亚式的出于人道主义的所谓同情,而是对于人类遭受的普遍苦难发自人性深处的悲悯。^④在悲剧诗人荷马笔下,失败者并非胜利者借以表达志得意满

的载体,而是胜利者审视自我、认识自我的借镜,正视敌对双方均不得不遭遇的不幸和苦难。这是一种古希腊人特有的灵魂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在任何事情上均能保持最高的清醒、纯粹和简朴”。^⑤战争对于参战各方无不意味着灾难:在费埃克斯宫廷宴会上,当歌人演唱特洛伊人和达那奥斯人中英雄豪杰殒命沙场时,奥德修斯不禁两次掩面哭泣,^⑥当歌人吟唱至木马屠城的故事时,作为木马计的策划者,奥德修斯心中非但没有丝毫得意,反而“听了心悲怆,泪水夺眶沾湿了面颊”。此刻的奥德修斯想到的不是当初自己的谋划如何高明,而是特洛伊妇女痛哭着扑向自己丈夫的悲惨场景“妇人看见他正在死去作最后的挣扎,不由得抱住他放声哭诉;在她身后,敌人用长枪拍打她的后背和肩头,要把她带去受奴役,忍受劳苦和忧愁,强烈的悲痛顿然使她面颊变憔悴。”^⑦奥德修斯这里绝非如某些解释家认定的为自己业已消逝的“昔日的荣光”哭泣。^⑧它毋宁是悲剧英雄灵魂力量主导下带有普世主义的悲悯情怀,这种力量正是大诗人荷马透过其如椽之笔灌注其中的。当老女仆发现众求婚者悉数陈尸厅堂不禁欢呼雀跃时,奥德修斯阻止道“老奶妈,你喜在心头,控制自己勿欢呼,在被杀死的人面前夸耀不合情理。”^⑨

荷马赋予奥德修斯的这一特有的灵魂力量,无论是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还是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抑或柏拉图的哲学著作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传承发扬。两部史诗都贯穿着复仇的主题,但均以冲突达成和解而结束。《伊利亚特》接近尾声,阿喀琉斯归还赫克托尔遗体,同时主动宽限十二天以便特洛伊人为赫克托尔举办葬礼。《奥德赛》最终以奥德修斯家族与

① 荷马《伊利亚特》,24.522-529.

② [英]加斯帕·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第68页。

③ James M. Redfield,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he Tragedy of Hecto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4.

④ 陈斯一:《荷马史诗与英雄悲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18页。

⑤ [法]西蒙娜·薇依《柏拉图对话中的神——薇依论古希腊文学》,吴雅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⑥ 荷马《奥德赛》,8.85-95.

⑦ 荷马《奥德赛》,8.521-530.

⑧ [意]格兰·莫斯特《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高峰枫,刘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61页。

⑨ 荷马《奥德赛》,22.411-412.

被杀的一百〇八位求婚者所属的伊塔卡权贵族达成和解结束。而且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两场和解都是在宙斯的极力推动下实现的，其中无疑寄托着诗人带有浓厚悲悯色彩的道德和政治理想。

荷马所开启的这一悲剧精神，在悲剧家欧里庇得斯那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公元前415年，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妇女》上演，该剧创作的现实诱因是此前一年雅典围攻弥罗斯并对之实施了屠城，^①其思想基源正是《伊利亚特》的尾声部分。《特洛伊妇女》上承《伊利亚特》，下启《奥德赛》，成为两部史诗之间的故事链环和精神桥梁，欧里庇得斯对史诗所传达的悲剧精神做了精到的注解和创造性发挥。在欧里庇得斯笔下，特洛伊人正在遭受的苦难正是希腊人即将面临的灾难的预演，正如悲剧诗人在弥罗斯人的遭遇中预感到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的悲惨遭遇一样。在悲剧《特洛伊妇女》开场，诗人即透过波塞冬宣示说：“你们这凡间的人真愚蠢，你们毁了别人的都城，神的庙宇和死者安眠的坟墓：你们种下了荒凉，日后收获的也就是毁灭啊！”^②在《奥德赛》开篇，荷马即透过雅典娜预言了整部史诗的主题“我要叫特洛伊人，我先前的仇敌，感觉欣慰，给希腊人一个痛苦的归程。”^③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对怀揣新帝国梦想的雅典人的提醒，与大诗人荷马对正沉浸于胜利喜悦中的希腊人的预警，彼此遥相呼应，振聋发聩。悲剧诗人将当下议题嫁接在古代素材之中，笔法委婉，教谕深沉，耐人寻味。

三、对比叙述中的伦理与道德劝诫

《伊利亚特》以最终遭遇洗劫的城市“特洛伊”即“伊利昂”题名，聚焦主人公阿喀琉斯愤怒的不断升级以及随之而来的报复的不断升级。《奥德赛》以主人公“奥德修斯”题名，

聚焦奥德修斯历尽磨难返回伊塔卡重建城邦秩序。《伊利亚特》将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并置，意在凸显两种英雄伦理的极端样态以及继之而来的悖谬后果。阿喀琉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毫无顾忌。赫克托尔瞻前顾后，致使他时常显得犹豫不决。阿喀琉斯只关心自己，凡事只从一己感受出发。对赫克托尔来说，爱意味着忘却自我，牺牲自我。对阿喀琉斯来说，自我是他唯一的钟爱对象。赫克托尔有着很强的责任感，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阿喀琉斯俨然如神，拥有不朽的铠甲，会人语的车骑、女神母亲忒提斯。赫克托尔属于完整的人类，他有家室妻儿、父母兄弟、国家同胞。对赫克托尔来说，保家卫国构成了他生命意义的全部。而对阿喀琉斯来说，自我荣誉构成他一切行动的核心，全部生命意义的终极依归。阿喀琉斯为“酒神精神”指引，为纾解满腔仇恨，破坏一切，毁灭一切。赫克托尔身上承载着“日神精神”，他竭尽全力保护脆弱的人类造物免受无谓的破坏。^④《奥德赛》将奥德修斯终得团圆与阿伽门农惨遭杀戮并置，旨在揭示同样作为战争胜利者，奥德修斯和阿伽门农截然不同的遭际以及当事者为此付出的政治和道德代价。

贯穿《奥德赛》始终的包括两条线索：一条是明线，奥德修斯历经磨难，终得夫妻父子团圆，濒临崩溃的伊塔卡城邦秩序最终得以重建；另一条是暗线，阿伽门农回到迈锡尼惨遭杀害，引发家族内进一步的惨祸。忠贞的佩涅洛佩与淫荡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诡诈的埃吉斯托斯与求婚者、特勒马科斯与英勇的奥瑞斯忒斯，彼此对观，相互烘托。奥德修斯家族终得保全，阿伽门农家破人亡。奥德修斯父子合谋屠戮伊塔卡一众求婚者，奥瑞斯忒斯替亡父阿伽门农复仇。就这样，无论是迈锡尼还是伊塔卡，特洛伊战争本身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却惊人地相似。两个城邦都注定要经受内战的血雨腥风的洗礼，都不得不面临城邦内政治秩

① [古希腊]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116. 1.

② [古希腊] 欧里庇得斯 《特洛伊妇女》，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7页。

③ [古希腊] 欧里庇得斯 《特洛伊妇女》，第183-244页。

④ Rachel Bepaloff, *On the Iliad*, Trans. by Mary McCart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105; James M. Redfield,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he Tragedy of Hecto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8.

序的破坏与重建,迈锡尼和伊塔卡以不同的剧情演绎出高度类似的政治戏码。阿伽门农若隐若现的幽灵,构成了《奥德赛》中时刻提点奥德修斯进而警示读者的“潜隐剧本”。

《奥德赛》开篇,宙斯即明言,埃吉斯托斯丧失理智,无视神的一再规劝,奸娶堂嫂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在先,谋杀堂兄阿伽门农在后,自己最终却死在阿伽门农之子奥瑞斯特的刀下,“欠债已一次清算”。^①雅典娜推许奥瑞斯特英雄般的壮举,规劝身陷类似困境的特勒马科斯务必将奥瑞斯特作为效法的典范“你不可稚气十足,你已非那种年纪。难道你没有听说神样的奥瑞斯特在人间赢得了荣誉?他杀死杀父仇人,诡诈的埃吉斯托斯,谋害了他显赫的父亲。亲爱的朋友,我看你长得也英俊健壮,希望你也能变勇敢,赢得后代的称誉。”^②

老英雄涅斯托尔向特勒马科斯缕述阿伽门农的遭际之后,随即便规劝说“亲爱的朋友,你不可离家太久太远,抛下家财不顾,把厚颜无耻之徒留在家里;切不要让他们把你的家财分光吃尽,你这趟航行白费辛苦。”^③

在冥府,阿伽门农的魂灵首先向奥德修斯缕述自己被害的详细经过,并满腔义愤地斥责道“无耻的女人转过身去,甚至都不愿伸手给正在去哈德斯的我抚合双眼和嘴唇。可见没有什么比女人更狠毒、更无耻,……她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既玷辱了她自己,也玷辱了后世的温柔的妇女们,即使有人行为良善。”^④阿伽门农的幽灵进而以自己的遭遇警示奥德修斯说:“你以后对女人不要过分温存,不要把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诉女人,要只说一部分,隐瞒另外一部分。……不过我仍要嘱咐你,你要用心牢记。你要秘密地让航船抵达故乡的土地,不可公开返回,因为妇女们不可信。”^⑤

正是由于阿伽门农的前车之鉴,到达伊塔卡后的奥德修斯始终满腹狐疑,反复试探,在确有把握之前绝不轻信妻子。在女神雅典娜的

明示下,奥德修斯首先与特勒马科斯相认,父子合谋计划诛戮求婚者的具体步骤,同时依然向妻子佩涅洛佩隐瞒自己身份,并设局试探家中男女奴仆们是否依然忠诚。趁强弓择偶之机,奥德修斯父子在两位男仆的协助下将求婚者及其私通的女仆秘密处决之后,奥德修斯这才最终向佩涅洛佩亮明身份,通过揭示关于婚床的秘密,消释彼此疑云,夫妻终得相认。

作为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反衬,佩涅洛佩守身如玉、治家有方且任劳任怨,是传统贵族社会女德的化身,而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则俨然一个恶贯满盈罪不容赦的无耻恶妇。“潜隐剧本”与前台剧本相互映照,彼此对观,诗人的道德文章于此一览无余,史诗的精神宗旨跃然纸上。在现实世界,“吕泰墨涅斯特拉”俯拾即是,“佩涅罗佩”实在是凤毛麟角。只有透过诗人的文学想象,佩涅罗佩才显得如此合乎情理,且行为世范,这既是诗人荷马的文化创制,更承载着诗人的文学愿景和淑世情怀。

将《奥德赛》中的“潜隐剧本”翻转为前台剧本,公元前458年上演的埃斯库罗斯《奥瑞斯泰亚》三联剧(《阿伽门农》《奠酒人》《报仇神》)堪称典范。在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笔下,无论是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埃吉斯托斯,还是奥瑞斯忒斯,都只不过是阿特柔斯家族内部诅咒式的复仇链环的一部分。阿伽门农的父亲阿特柔斯与埃吉斯托斯的父亲堤厄斯忒斯本是堂兄弟,两人曾为争夺迈锡尼王位大打出手,结下血海深仇。阿伽门农出征特洛伊,埃吉斯托斯便趁机想方设法诱惑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并与其私通,而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此前则因阿伽门农率军出征途中将自己女儿伊菲革涅亚献祭而怀恨在心,于是,共同的敌人促使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与埃吉斯托斯达成了复仇式共谋。最终在幕后主使埃吉斯托斯的一手策划下,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将阿伽门农活活砍死在浴盆之中。

奥瑞斯忒斯替父报仇,血债血还,将克吕

① 荷马《奥德赛》,1.43.

② 荷马《奥德赛》,1.297-302.

③ 荷马《奥德赛》,3.313-316.

④ 荷马《奥德赛》,11.425-434.

⑤ 荷马《奥德赛》,11.441-456.

泰墨涅斯特拉和埃吉斯托斯一并杀死。奥瑞斯特斯弑母是否合理合法？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弑夫之举是否足以为奥瑞斯特斯的弑母之举提供充分的理据？如果奥瑞斯特斯弑母是正义之举，那么凭什么说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替女儿复仇就是不义的？同样是仇杀，在荷马笔下，奥瑞斯特斯被捧上了天，流芳百世，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却落得千古骂名，遭后人唾弃。为此，悲剧诗人笔下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抱怨道“我被最亲近的人害得这样惨，却没有一位神为了我死于杀母的儿子之手而动怒。”^①这既是埃斯库罗斯从《奥德赛》中分析出的极具当代性的道德和法律难题，更是悲剧家对诗人荷马“父权式”道德立场针锋相对的拷问辩难。

对于奥瑞斯特斯弑母案，耐人寻味处在于，《报仇神》中的雅典法庭围绕该案投出的定罪票和赦罪票旗鼓相当，而雅典娜最终投出的追加票认定奥瑞斯特斯无罪。女神辩称自己投赦罪票的理由在于自己并没有生身之母，“我不会更重视一个杀死丈夫、杀死家庭的守护者的妇人的死”。^②从表面来看，这样的情节与宙斯要求阿喀琉斯归还赫克托尔遗体、要求奥德修斯与伊塔卡人重新缔结友谊的情节类似，但雅典娜的判决理由实在荒谬可笑。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或许是截断复仇链环的唯一出路，是结束内讧、防止更大范围的暴力流血的必经之途，是实现迈锡尼内部和解进而重建城邦秩序所必须作出的政治决断。这与《奥德赛》尾声宙斯给雅典娜的叮咛可谓异曲同工。在《奥德赛》尾声，宙斯对雅典娜嘱咐道“既然英雄奥德修斯业已报复求婚人，便让他们立盟誓，奥德修斯永远为国君，我们让这些人的孩子和兄弟被杀的仇恨忘记，让他们彼此像从前一样，和好结友谊，充分享受财富和安宁。”^③显而易见，这正是诗人面对政治世界的极端恶而不得不采取的文学曲笔，是诗人驰骋想象旨在涵育人心所作出的又一文化创制。诗人荷马不仅在

勾勒人性，而且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改造人性，即便不能使其完全趋向善，能够使人们对周遭世界的极端恶保持警惕和些许抵抗力，也是难能可贵的。

四、荷马与柏拉图：诗与哲学之争

哲学与诗歌、哲人与诗人之间的对立与纷争由来已久，双方彼此攻讦，势同水火，诗人攻击哲人都是些“冲着主人汪汪乱叫的家犬”“夸夸其谈的蠢货”，哲人则攻击诗人都是些“迎合大众趣味的自以为是者”“耽于思考的乞食者”。^④

有关诗与哲学之争，研究者们努力调和两者之间的对立。一般的调和策略可大致概括为两种路向：第一种路向往往依据柏拉图的上下文，认为柏拉图这里只是提出问题，最终还是希望有人能够为诗作出更加充分的辩护，进而化解哲学与诗之间的分歧。在提出诗与哲学之间的对立之后，柏拉图透过笔下的苏格拉底指出“不管怎样，就让这事这么说，如果这一为快乐服务的诗歌模仿艺术能说出某种道理，证明在一个受到良好治理的城邦中它应该有个地位，我们至少高兴地接受它，因为我们至少知道我们自己如何受它那些魅力的影响。……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让它的那些捍卫者，只要它们本人不作诗而只是诗歌的爱好者，用不带格律的语言为它答辩，证明它不仅甜美，而且对于城邦管理和人民的生活有益，我们会心平气和地听他们说。因为我们也许会从中得到好处，如果它不仅显得甜美，而且有益。”^⑤亚里士多德正是柏拉图预期的诗的辩护者。通过《诗术》，亚里士多德在为诗系统辩护的同时，试图在诗与哲学之间找到调和的路径。亚里士多德撇清诗与历史之间的界限，同时将“逻各斯”引入诗，史诗和悲剧讲述神话，就是在编写带

① [古希腊] 埃斯库罗斯 《报仇神》，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1-391页。

② [古希腊] 埃斯库罗斯 《报仇神》，第739-740页。

③ 荷马 《奥德赛》，24.482-486。

④ 柏拉图 《理想国》，607b5-607c。

⑤ 柏拉图 《理想国》，10.607c4-e2。

有普遍性的故事情节,制作哲学“逻各斯”。为此,亚里士多德结论指出“诗比之史述更具哲学性、更高尚,因为诗更多讲述普遍之事,而史述更多讲述个别之事。”^①

第二种调和策略认为,尽管柏拉图对诗歌的批评不乏其针对性,但诗与哲学由来已久的纷争本身就隐含着“诗具有不同于哲学的重要特质,哲学只有面对诗才能真正地界定自身”,而作为“缪斯之艺”的哲学活动,其本身的自我界定就离不开诗。所谓诗与哲学之争,从根本上说,是哲学与诗的根本统一派生的结果。而且,柏拉图采用对话体“哲学戏剧”这样的写作文类,其中大量采用柏拉图自己所批判的悲剧诗人的摹仿手法,与荷马以及悲剧诗人类似,柏拉图透过自己笔下的虚拟对象说话,这是俨然一种“诗化哲学”。柏拉图也像诗人那样讲述神话,诸如关于古格斯戒指的传说、地生人神话、关于厄尔的神话等等。这样,诗与哲学的纷争“消失在创造的话语中,结果诗不像诗、哲学不像哲学,而是哲学的诗”。^② 哲学诗人柏拉图“真正融摄了诗”,从而“把哲学塑造成最高意义上的‘缪斯之艺’”,最终取代荷马的‘诗教’地位。这样,诗与哲学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在柏拉图式的“诗化哲学”那里最终得到化解。^③

在柏拉图关于诗与哲学关系问题上,当代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上述调和立场。^④

然而,从思维方式到精神指向,哲学与诗歌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是根本性的,柏拉图对荷马及悲剧诗人的批判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更是道德和宗教意义上的系统批判。对于长期作为希腊精神主轴的以荷马以及悲剧诗人代表

的诗教传统,柏拉图哲学发起了一场带有颠覆性的思想革命,“柏拉图对希腊文学和宗教传统的拒斥在道德和心理两个层面同时展开。这两个层面的批评构成了柏拉图主义的关键核心,是柏拉图哲学思想在这两个层面的自然延伸。”^⑤

诗歌诉诸口头传颂,通过舞台表演模拟古代英雄行迹,借以垂裕后昆,教谕世人。哲学诉诸内在沉思,通过批判性分析探索人之为人的秩序准则,包括内在的精神秩序和外在的法律秩序。诗歌诉诸人的感性,而哲学诉诸人的理性。诗歌凭靠的是人的记忆,而哲学凭靠的是人的理性。至公元前5世纪,哲学与诗歌之间的对立具体表现为以荷马为代表的诗教传统与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系的哲学教育之间的分野,这一争执背后折射的毋宁是以《荷马史诗》为典范的神话式的具象思维与风头正劲的科学化的抽象思维之间的对立。^⑥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具有强烈现实指向的立法诗,是古希腊人涵育情感、塑造人格、确立秩序的范本。在荷马的诗教传统中,甜蜜的阳界与阴森的冥界之间的巨大反差、生前荣耀辉煌,死后寂寞恹惶。灵魂与肉身不可须臾分离,“一旦人的生命离开白色的骨骼,魂灵也如梦幻一样飘忽分离”。^⑦ 神明给人任意分配祸福,得福便及时行乐,遇祸就只能忍受。一个人生前的德行与最终的命运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阿伽门农辛苦作战,宙斯却让他“归返时遭受到悲惨的死亡,倒在埃吉斯托斯和可憎的妻子的手里”。^⑧ 费埃克斯人敬畏神明、内政修明,谨遵待客之道,天神不仅要他们在他们护送奥德修斯归返后将其船只击碎,“使他们不敢再护送漫游人”,而且“还要用一座山峦把

① 董明珠《亚里士多德〈诗学〉译笺和通释》,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年,第210-211页。

② [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③ 张巍《希腊古风诗教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2-78页。

④ 参见[美]彼得·阿伦斯多夫《柏拉图与荷马:两位哲学性诗人之间的争论》,熊文驰译,载洪涛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1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加拿大]普拉宁克《柏拉图与荷马——宇宙论对话中的诗歌与哲学》,易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Rana Saadi Liebert, *Tragic Pleasure from Homer to Pla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⑤ Thomas Gould, *The Ancient Quarrel Between Poetry and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22.

⑥ Eric A. Havelock,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276-305.

⑦ 荷马《奥德赛》,11.221-222.

⑧ 荷马《奥德赛》,24.96-97.

他们的城市围困”。^①

如果荣誉不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那么谁还会在意当世人们的眼光、后世人们的臧否，从而终日乾乾，诚惶诚恐，如履薄冰？设若美德懿行与好运福分不相匹配，那么谁还会坚定不移地践行美善正义？假如天神和凡人一样，遇事利字当头，不顾正义，那么世上之人谁还会敬畏神明，中正节制？

针对荷马教义的上述诸多纰漏，在伦理和政治价值观层面而言，柏拉图对荷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荣誉是否可欲、德福是否相配、天神是否正义。

按照柏拉图对灵魂品类的排位，诗人作为摹仿者，其品类排位相当低，属于第六品，仅排在工匠或农民的灵魂品类之前。^②在柏拉图看来，诗人荷马最多只是治国理政技艺的模拟者，并不具有诸如吕库古、梭伦这样的真正立法家的技艺。^③

在柏拉图式的哲学那里，世界的原动力不再如荷马宣称的是所谓全知全能的宙斯，而是人自身即人的灵魂。灵魂俨然如神，永生不灭，它自生自发，自体自根，不假外求。热爱智慧、修习哲学就是在练习死亡，对于热爱智慧之人来说，在身体和灵魂之间更看重灵魂。在热爱智慧之人眼里，死亡只不过是朽的肉身的寂灭，非但不会带来丝毫痛苦，反而使灵魂摆脱肉身的羁绊，获得真正的自由，从而使灵魂能够完全凭靠纯净的思想探究事物本身。哲学教育就是通过灵魂助产实现灵魂转向的过程，它意味着将灵魂从低处引向高处，从生成之物引向存在之物，从表象转向实在，从意见转向真理，从低劣邪恶转向美善正义。

在《奥德赛》中，当奥德修斯进入冥府，对阿喀琉斯生前身后表达由衷的欣羨时，阿喀琉斯却说自己宁愿做个普通农民，也不愿在这阴森的冥府统治众亡灵。《伊利亚特》中那个视荣誉为至宝甚至不惜为之献身的阿喀琉斯被

《奥德赛》中冥府中阿喀琉斯的魂灵消解于无形，这与其说是“英雄人格的正反两面”，^④还不如说是诗人对英雄世界观某种程度的反思式解构。战场上的阿喀琉斯用生命建构起来的荣誉却被冥府中的阿喀琉斯彻底解构，而这恰恰是柏拉图培养城邦护卫者所要极力避免的。在柏拉图看来，培养自由且勇敢的城邦公民，对荣誉的热爱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为了捍卫城邦的领土财富和集体安全，城邦公民尤其是护卫者必须具有个人和集体的荣誉感，他们不仅需要坚强的体魄，而且需要有充沛的气魄，即一种“不可抗拒、不可战胜的东西，只要有它在一旁，整个灵魂对一切都毫无畏惧，不可征服”。^⑤若城邦卫士接受了上述荷马式教条的浸染，必然成为一帮贪生怕死、苟且偷生之辈。

《理想国》临近尾声，柏拉图不厌其详地讲述阵亡战士厄尔的传奇故事。灵魂脱离肉身第十二天后复活，进入神域。其中不义者的灵魂满身污秽，他们“一边哀叹、一边哭泣，因为它们回想到自己从大地上上来的旅途中曾忍受过和目睹过多少次和多少种不幸——况且这一走就是一千年——而那些来自天空的灵魂则叙述了它们的幸福经历和它们所看到的无比神奇的美丽景色”。^⑥作恶多端者必然遭到加倍的惩罚，胸怀正义者必将得到美好的报偿。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追求高尚还是陷入卑劣、奉行正义抑或假仁假义甚或不仁不义，全在于他自己，与神无关，因为灵魂是永生的，天神总是正义的。

柏拉图式的哲学技艺与荷马式的诗歌技艺之间的争执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在于：建立文明秩序，是从荷马式的“人欲”现实出发，还是从柏拉图式的“天理”设定出发？政治理论是“是其所是”地解释世界，抑或“是其应是”地改造世界？是荷马式的以神话式的具象思维

① 荷马《奥德赛》，13. 151 - 152.

② 柏拉图《斐德若》，刘小枫译，248e.

③ 柏拉图《理想国》，599d.

④ 陈斯一：《荷马史诗与英雄悲剧》，第177页。

⑤ 柏拉图《理想国》，375b1 - 3.

⑥ 柏拉图《理想国》，615a1 - 5.

为载体的情感教育,抑或苏格拉底式的以科学式的抽象思维为载体的理智教育?政治理论家的工作对于政治本身能够且应当产生怎样的效用?

哲学与诗歌之间的这场由来已久的争执,经由柏拉图发生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革命。在柏拉图那里,美善正义构成好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内涵,是人之为人为最真实的存在,它既是可以得到充分论证的真理,更被标举为真确无疑的信仰。古典学家汉密尔顿指出:“在耶稣诞生前四百年,这个世界从他的1一言一行的信念中汲取了一种勇气,

人们凭借这种勇气,透过这个混乱、黑暗、无益的生活,真的发现生活有一个善良的目的,人们能够找到这个目的并将其展现出来。”^①在西方文明史上,柏拉图开启了一场全新的价值革命。以荷马和悲剧诗人为代表的悲剧文化让位于一种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的新文化。在这一由柏拉图开创的新文化中,人不再是神的前定宿命的消极承受者,而是自身命运的积极掌控者、自我生活方式的设计者和在世幸福生活的创造者。正是透过柏拉图的这一文化创制,西方文明精神从此别开生面,获得了全新的精神根基。

■责任编辑/宋雨桃

“Educators in Greece”: Homer's Political Theory

REN Jun-fe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from literary forms to thought patterns, Homer elevated the creative spirit of mankind to the pinnacle of achievement. The Homeric Epics serves as a natural matrix and abundant source of Western thought, providing fundamental materials and inspiration for tragedians and historian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an explo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path of the two epics,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as well as their intrinsic connections, revealing the creative intentions and political teachings of the two epics. It then analyzes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dispute between Plato and Homer,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 and the crucial significance of this disput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Keywords: The Homeric Epics; Plato; Achilles; Odysseus

^① [美] 依迪丝·汉密尔顿 《希腊精神》,葛海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